

青年毛泽东这样办

最有分量报纸

□ 吴平 李文邦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创办并亲自主编的第一个正式报纸，是五四时期以湖南学生联合会名义在长沙出版发行的一张四开四版小型报纸，每周一张。自1919年7月14日创刊问世至8月被军阀张敬尧查封，共出版发行四号与临时增刊第一号。李大钊看到《湘江评论》后，称赞《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报刊之一。

《湘江评论》创刊的经过

五四运动时期，全国传播新思潮的刊物争先恐后地涌现，至1919年7月，长沙出现了《岳麓周刊》《女界钟》等进步刊物，但影响都不是太大。湖南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深得大家信任，被一致推举担任主编。

毛泽东出任《湘江评论》主编，既是众望所归，也是欣然受命，青年毛泽东既有办报的热情、能力，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公众影响力。

从办报意愿和热情来看，毛泽东渴望创办一个刊物以团结有志之士共

同奋斗的想法由来已久。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视报刊对民众的宣传作用，让毛泽东对于报刊有了启蒙认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从事的革命报刊编辑活动，给了毛泽东深刻启发。毛泽东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和追随者，后来他自己回忆时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

从能力来看，其一，毛泽东自幼天资聪颖，胆识过人，入学后勤奋好学，饱读诗书。在《湘江评论》创刊前，毛泽东已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其二，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来到北京，后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并先后拜访了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当时的北大校园思想空前活跃，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加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两个学术团体。新闻学研究会宗旨为“输灌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由蔡元培亲任会长，徐宝璜任研究会主任，聘《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导师。徐主讲新闻学基本知识，邵则主讲新闻采编业务，他们的办报主张和业务思想，都对毛泽东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三，毛泽东在主编《湘江评论》之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办报实践经验，例如在一师学习期间就汇编过《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等小册子。

《湘江评论》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出版，第二号于7月21日出版（同日出版了《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第三号于7月28日出版，第四号于8月4日出版。8月中旬，《湘江评论》小样刚刚打出未及发行，便遭到张敬尧的查禁，理由是宣传“过激主义”。《湘江评论》被迫停办的同时，湖南学联也遭强行解散。

《湘江评论》的主要内容

在编排形式上，《湘江评论》借鉴了当时影响力较大的《每周评论》；在内容上，发扬了中国近代报刊长于政论的传统，以评论为主。主要栏目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等。

《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办报宗旨，对国内外最新革命形势进行报道、评论，发表了大量充满革命激情与富有批判精神的文章，介绍了有关政治、教育的最新思想，热情讴歌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其意义，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腐朽本质作了一针见血的抨击，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与封建落后思想。可以说，每一号散



发油墨清香的《湘江评论》，都是为读者准备的营养丰富的思想大餐。

《湘江评论》所刊文章中，影响最大、反响最强烈的当属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此文连载于二、三、四号，紧扣“宣传最新思潮”的办刊宗旨，对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大联合的方法以及民众大联合必定成功的道理，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的关键。这成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雏形。文章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展现了青年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湘江评论》的特色

毛泽东既是《湘江评论》的主编，又是主要的撰稿人和发行人，为刊物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努力。《湘江评论》创刊号、二、三、四号以及临时增刊第一号中，总共刊载毛泽东的署名文章40篇，超过总稿件数量的40%。《湘江评论》主要有以下特色。

第一，宗旨明确，思想先进。毛泽东在《本报启事》中，开宗明义地宣告“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纵观报纸文字，无论是长篇大论，还是短小随笔，都始终贯彻了这一宗旨：反帝反封建，倡导民主与科学。

第二，视野开阔，目光长远。报纸报道宣立意高远，文章都是关于一些大事件，捕捉的都是热点问题，所发议论高屋建瓴，对问题的剖析入木三分。报道涉及的范围也不只局限于湖南，而是放眼全中国全世界，充分体现了青年毛泽东的眼光和智慧。

第三，融思想性、战斗性于一体，将宣传报道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

第四，编排醒目，文笔优美。《湘江评论》全部采用白话文写作，具有文字通俗、笔调活泼、言简意赅的特

点，对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都有吸引力。报纸主要采用专栏结构，层次清晰，阅读方便。为了更贴近读者，还辟有《答读者问》专栏，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以引起群众的共鸣。

《湘江评论》的影响

《湘江评论》从创办到被查封，虽然只出版了四号正刊和一号临时增刊，前后只存在一个多月时间，但被公认为是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影响十分深远。创刊号首印两千份，马上就卖完了，再印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从第二期起刊物开印五千份，这在当时的报刊中已经是很大的发行量了，但仍然供不应求。《湘江评论》寄到北京后，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高度重视。胡适认为《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此外，当时北京、上海、成都等一些报刊都全文转载或摘要转载了《民众的大联合》。可见《湘江评论》得到了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其他刊物的高度认可。

《湘江评论》的巨大影响力还表现在对青年和学生的启发很大，引导了一大批青年投身到救国革命事业中来。许多人正是从阅读它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萧劲光曾谈到：“邇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郭亮、向警予也是受到《湘江评论》的影响才投身革命的洪流之中，后来均成为我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

（摘自2014年第2期《出版科学》，原标题为《青年毛泽东与〈湘江评论〉》）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名称提出第一人

□ 李永春

3月30日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诞辰125周年纪念日。蔡和森在建党前夕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实际参与创建党的活动，对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立下远大志向。他动身去北京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提出，3年内使学会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到法国

勤工俭学后，蔡和森“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研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成为我国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在法期间，蔡和森总结德国社会党和各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研究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

在此基础上，1920年7月他在蒙达尼会议上首次提出“组织共产

党”的主张，同年8月向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准备”建立政党，“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他在给毛泽东信中提出，计划在1920年冬联络在法国的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世界社等进步社团成员，共同讨论，如果能在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两点上达成共识，拟“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蔡和森所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在时间上也明显早于1920年11月在上海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蔡和森在法国期间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和建党理论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并对党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回国后在党的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早期党的巩固和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2012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建党过程中蔡和森的多个“最早”》）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理论刊物《共产党》

□ 刘莹莹 赵云泽

《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这一天也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3周年纪念日。该刊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主编李达。这是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的理论机关刊物。它主要介绍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学说，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刊载第三国际的重要文件，报道共产主义运动在各国的发展，同时批判了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它对促进国内工人运动的发

展，统一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思想，以及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共产党》月刊每期约50页，最初3期由《短言》、正文和《世界信息》3部分构成，从第4期开始增加了《国内消息》栏目。除了李达，其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如陈独秀、沈雁冰、施存统等也为之撰稿。

该刊的秘密编辑组先设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后迁到南成都路辅德里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秘密

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以各种方式分发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其中，随《新青年》赠送是月刊发行的主要方式；通过寄送将月刊分发至远离上海的地方，也是常见的发行方式。尽管不是公开发行，该刊的最高发行量仍达到了5000份左右。

《共产党》月刊在创刊号的《短言》明确提出要“跟着俄国共产党”，宣布“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刊号还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等文章，诤

歌十月革命并介绍俄国共产党的经验。

由于《共产党》月刊是半公开的秘密刊物，一般随《新青年》一起附赠，社会影响似乎不大，但它的历史意义却不容忽视。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党的出版物，除《新青年》外还有《共产党》，销数很广，宣传亦很有力量。”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共产党》月刊于同年7月出版了第6期后停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摘自2016年第7期《新闻界》）

战地办报：晋察冀根据地的新闻奇迹



□ 阎丽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即便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仅晋察冀根据地所办的报刊就有几百种。报纸有《晋察冀日报》（前身为《抗敌报》）、《子弟兵报》、《冀中导报》等，期刊有《晋察冀画报》《战线》《抗战生活》等。这些报刊成为时代号角，凝聚起千百万民众的抗战信心，鼓舞了千百万民众的抗战热情。

那么，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这些报刊是怎样出版的呢？我们选取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和期刊给大家介绍，以纪念这些以笔代枪、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们。

“民族的号筒”：敌后办报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晋察冀日报》

《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是《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在阜平县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创刊，最初为石印，三日刊，社长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1938年4月，《抗敌报》转为晋察冀省委的机关报，邓拓任报社社长，主持报社工作。1938年8月16日，报纸改为铅印，隔日刊。1940年11月7日，改为《晋察冀日报》，为日刊。报纸的内容以国内新闻、国际新闻、通讯、社论、诗歌、漫画等为主，并创办了副刊《老百姓》。所刊载的文章大多通俗易懂、诙谐幽默，成为根据地军民了解八路军抗战和根据地政策的主要渠道，也是边区党政军民对敌作战的重要宣传武器。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与其他报纸合并为《人民日报》），在十余年的办报时间里出版2845期，发行量从最初的1500份扩大到几万份，最多时达5.5万份。

在《晋察冀日报》办刊过程中，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最有名的是“八匹骡子办报”“七进七出桦子尖”。

为适应游击办报的需要，报社人员尽量减轻设备的重量以便于转移，比如排字工人把铅字缩小，把笨重的字架改成可装卸的轻便字架，把笨重的石印机改成用枣木制成的结实轻便的木制机。邓拓还要求编辑和记者写文章都限定在3000字以内，以减少字盘重量。同时，邓拓还用特制木箱装字盘，装好就能搬走，架起就能检字。因为报社的全部设备拆装方便，敌人来时，拆完装入箱子搬到骡背上就走。等到了安全环境，立即卸下设备，安装完毕就可以开工。全部设备用八匹骡子就可带走，非常适合当时的游击环境，因此就有了“八匹骡子办报纸，三千字内著文章”的说法，可谓中外新闻史上的奇迹。

桦子尖是平山县滚龙沟南山深谷中的一个小山村，1940年冬至1942年春，晋察冀日报社曾长期在滚龙沟一带驻扎。1941年8月22日，日伪军7万多人“扫荡”晋察冀边区，2000余敌人合围滚龙沟一带。当时，报社为了赶印当天的报纸，行动迟了一步，来不及转移设备，于是，他们把设备埋藏在桦子尖，报社人员则与当地群众、民兵、游击队一起与敌人周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敢机智地“七进七出桦子尖”，反复七次挖出设备工作，埋好设备转移，硬是在敌人“扫荡”的25天时间里出了23期报纸，对稳定根据地民心军心、鼓舞军民抗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为了出版和发行好《晋察冀日报》，在抗战期间有34位报社工作人员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还有多人在发送报纸途中献出了生命。《晋察冀日报》和晋察冀根据地一起发展壮大，它不但见证和记录了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壮大，而且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创举和榜样，被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誉为“民族的号筒”。

“活生生的事实”：真实记录敌后恢宏壮阔抗战和热火朝天建设的《晋察冀画报》

《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摄影画报，创刊于1942年7月7日，共出版13期。1948年5月20日，晋察冀画报社和晋冀鲁豫人民画报社合并为华北画报社。

说到《晋察冀画报》，不能不提著名摄影家沙飞。全面抗战爆发后，沙飞从桂林北上，10月份到达晋察冀，经聂荣臻特批成为随军摄影记者，不久便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沙飞拍摄了许多有关八路军抗战的照片。为了让大家了解八路军抗战，1939年春，沙飞等人在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摄影展。尽管照片不多，也不大，但引起了很大轰动，十里八乡的群众像赶庙会一样前来参观。那时候老百姓大多不认识字，不能看报纸杂志，但他们能看懂照片，能从照片上直观地看到八路军战斗和胜利的情景。

这次展览还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称赞，他说：“你们这样做很好，不识字的人能看懂照片，这样的形象宣传作用大。”展览出人意料的成功和聂司令员的鼓励，使沙飞萌生了印制画报的想法。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画报印制的难度远高于报纸。首先需要人才，包括摄影、制版、刻字等人员。其次需要设备，包括相机、铜板、锌板、上等的纸张和油墨，以及各种化学制剂等。这些东西在大城市都是紧缺物资，更别说在被日军严密封锁、条件艰苦的根据地了。因此，沙飞的想法在当时听起来有点异想天开。但沙飞的想法得到了晋察冀军区领导，尤其是聂荣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军区领导表示：筹办画报的一切经费都由军区解决，在尽量节约的原则下，要多少就给多少，需要什么人就调什么人，全力支持创办画报。领导的支持给了沙飞极大的信心，他们从全军区搜罗各种有用的人才和设备，并自己动手制造设备。边区解决不了的就通过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购买。为了购买和护送这些设备，地下党组织历经艰险，有些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支持制作照相制版的镜头，聂荣臻还贡献出了自己的军用望远镜。

经过3年的准备，1942年5月2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沙飞任社长，全社共100多人。尽管此时日军对根据地展开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扫荡”，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晋察冀根据地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但画报社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1942年7月创刊。在庆祝大会上，聂司令员对画报社全体人员予以表扬和奖励，并为画报亲笔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个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如何艰难困苦地抵抗着日本强盗！”

画报出版后传到各根据地和敌占区，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和鼓舞，也让日军非常震惊。日军一面加紧封锁印刷制版物资，一面“扫荡”根据地，并把画报社作为重要的袭击目标之一。

1943年4月19日晚，画报社正在平山县东黄泥一带赶印第三期画报，突然有群众送信说日军正向此地进犯，赶紧转移。于是，大家马上停止工作，拆卸设备，搬运埋藏好，准备转移。此时，日军已将村子三面包围。在突围中，著名摄影记者雷烨不幸遇难。

虽然日军的“扫荡”、袭击经常发生，但晋察冀画报社却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所印制的画报愈发精美，让看到的人爱不释手，视若珍宝。当时各根据地吧“陕甘宁的广播，晋察冀的铜板”视为我党在宣传工作上的两大创造和法宝。

如今，我们看到的有关晋察冀抗战的照片大部分出自《晋察冀画报》，它不但向世界证明了八路军在敌后进行着英勇的抗战，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历史影像。

（摘自2015年第24期《共产党员（河北）》）